特别关注·长征影像

图文军史馆

最后的合影

■李 放

影像是一段历史最直观的记录。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红军留存至今的照片并不多。这些照片都承载着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本期，我们选取其中两张照片，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伟大长征精神。

——编 者

右边这张合影拍摄于1935年8月。照片里的人都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前排左一到左四，分别是时任红25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在拍摄这张照片之前，红25军经历了9个多月的浴血转战。拍照时，吴焕先、徐海东全都带着伤病，照片上没有出现的红25军军长程子华也身负重伤。

那么这张合影是在哪里拍摄的，又是谁给他们拍摄的呢？1934年11月，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实行战略转移，2980多名官兵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征途。他们一路经历独树镇战斗、庾家河反击战等血战。军长程子华两只手都受了重伤，副军长徐海东脸部中枪，昏迷多日。随后，红25军得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判断红军主力很有可能北上。于是，他们果断决定西征北上，牵制国民党兵力，为中央红军的北上减轻压力。

甘肃两当县位于陕西和甘肃的交界处，是从陕南进入甘肃的交通要道。红25军于1935年8月初包围了两当县城。进城后，红军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主张，组织打土豪分粮食。战士们还利用休息时间帮群众抢收庄稼。一时间，两当城内红旗招展，“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戴季英从两当县城雇请了两位照相师，拍下几张珍贵照片。这张合影就是这样诞生的。

让人痛心的是，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不到20天后，吴焕先就壮烈牺牲。1935年8月21日，四坡村大雨倾盆，汭河河水猛涨。红25军强渡汭河的时候，王母宫塬上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沿着王母宫塬的塬顶突袭而来。这时，大部队已经渡过汭河，无法回援。在塬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25军第223团顿时陷于被动，形势危急。吴焕先亲自带领100余人，沿着王母宫塬上的羊肠小道，攀上塬顶，直插敌军侧后，在制高点发起强攻。敌人乱作一团，抱头鼠窜。吴焕先一边指挥部队反击敌人，一边大声疾呼：“同志们，顶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战斗中，吴焕先不幸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这张合影成为了吴焕先与大家最后的合影。



红25军部分官兵1935年8月在甘肃两当拍摄的合影。 作者提供

郭述申将这张照片一直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时，这张照片由杨尚昆同志转到斯诺手里，后来被收录在《斯诺眼中的中国》里。

“看照片，起思念”

■金正貌

“看照片，起思念，红军哥哥在哪边？王政委，你在哪？亲人们身体可平安？”这首苗寨山歌，在贵州毕节广为传唱。它源自长征途中的一张珍贵合影。歌曲的创作者就是右图中站在最高处的苗族群众王义佳。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渡过乌江，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县。红军来到苗寨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贵州大定县（今贵州毕节大方县）的八堡六寨。苗族同胞奔走相告，四处打听红军的下落。这份热情和急切，让红军官兵都有些意外。此前国民党军到处污蔑红军，导致许多地方群众对红军误会很深，为何这里的苗族同胞会如此热情？

早在1935年4月，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红9军团孤军转战黔西北，攻占了大定县的盐业重镇瓢儿井。驻留期间，红军没收官僚盐号囤积的食盐，分发给各族贫苦群众，还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为群众谋利益，让群众了解了这支军队的主张，消除了误会。

当苗族同胞得知，又一支红军队伍来到这里，大家欢欣鼓舞。1936年2月15日，大定县八堡六寨的苗族群众派出9名代表，翻山越岭赶到红6军团司令部。他们只有一个请求——与红军一起战斗。时任红6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请他们吃饭，向他们讲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当时王震说了一番话，让苗族代表们印象深刻：“苗家山上树木根连根，我们汉人和苗家心连心”“虽然我们的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都是一家人”。王震的这些话，像一股暖流淌进了苗族代表们的心里。第二天，王震特意请来照相师傅，和大家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

照完合影后，王震又吩咐部队给这些群众每人一支枪，还给了他们一些大洋。这在当时对苗族同胞无疑是巨大支持。红军走后，这个故事在苗寨山区代代流传了下来。

当时照片冲洗出来之后，9名苗族群众代表一共拿回去2张留作纪念。但由于保存条件有限，照片损毁得厉害。直到20世纪60年代，相关部门从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续西行漫记》一书里，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清晰版本。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照片中的人除了王震，其他人的身份也无从得知。

后来，贵州党史部门的同志通过照片上苗族同胞穿的衣服图案，推断出这是当时大定县八堡六寨一带群众的服饰。工作人员来到贵州毕节，通过多方比对，最终发现，一处建筑的窗户形状、花纹格式和砖墙的纹路，都与照片上完全一致。他们也因此找到了照片上的苗族同胞王义佳和李义竹，两人清晰回忆了照片拍摄的细节。



王震（前排左一）和贵州大定（今大方县）八堡六寨的9名苗族同胞，以及5名汉族青年的合影。 作者提供

这张照片是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福音堂的后面拍摄的。照片上一共有15个人，除了王震和9名苗族同胞，还有同行的5名汉族青年。站在王震旁边的苗族同胞叫李德洪，当时他年龄最小，王震就让他到身边来拍照。照片中独自站在最高处的是王义佳。他拍照的时候爬到了后面高处。当时大家让他下来站在前面，他说：“我就喜欢站在高处。”王震笑着说：“那就让他站在那里吧！”

9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看这张照片。9名苗族代表，绾着木梳发髻，和身穿大衣的王震以及另外5名汉族青年站在一起，正是军民一家亲的真实写照。

文物背后的故事

锦幛见证深厚情谊

■孙 国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幅红色的绸缎锦幛。锦幛长2.85米、宽0.64米，上面书写“兴盛番族”4个字。锦幛右端竖书“中甸归化寺存”，左下角竖书“贺龙”。这幅锦幛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贺龙赠送给中甸归化寺的。它凝结着红军官兵对藏族同胞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汉藏团结的一段佳话。

1936年4月下旬，贺龙率领红2、红6军团，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抢渡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进入滇西北藏区中甸县（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一路前行中，粮食不断消耗，前面还要翻过多座雪山，红军急需粮食补给。

中甸县城外的归化寺（今噶丹·松赞林寺）是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素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枢。新中国成立前，寺里八大老僧组成的老僧会主持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红军将至之际，国民党军在当地散布谣言：“红军来了要抢牛羊，杀人灭教！”部分民众因此躲入深山，归化寺也紧闭寺门。

得知这一情况，贺龙严令官兵尊重藏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并颁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申明“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承诺化为行动。红军官兵不踏青稞田、不进经堂、离开时打扫干净、借物必还。官兵宁可露宿街头挨冻，也不惊扰民众安睡。红军的举动如春风化雨，渐渐融化了当地民众心中的坚冰。

归化寺派村寨头人夏那古瓦为代表，与红军接洽。4月29日，贺龙在驻地热情接见了夏那古瓦一行人，阐明了红军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民族宗教政策，并亲笔致信八大老僧：“掌教八大老僧台鉴：（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八大老僧读罢此信，随即再派夏那古瓦拜谒贺龙，并邀请贺龙赴寺院访问。

5月2日，贺龙率红军代表40余人应邀前往归化寺。他们离归化寺还有一段距离时，就看见穿着绛红色袈裟的喇嘛们列队站在大门口，欢迎他们的到来。贺龙等人跳下马来，步行走到喇嘛们中间，双手合十，按照藏族的礼仪祝愿他们吉祥如意。寒暄过后，在喇嘛的指引下，贺龙等人进入大殿。

在欢迎仪式上，贺龙代表红军广大官兵讲话。他说，红军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其宗旨就是要解放全中国，使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红军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寺院和僧侣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红军此去是为了抗日，到中甸只是路过，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整和筹集粮秣。贺龙说到这里，八大老僧疑惧全消，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纷纷发言说，之前我们误听了国民党的宣传，对红军产生恐惧心理，经过耳闻目睹，觉得红军确实是一支天底下最好的队伍；红军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保护藏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寺院秋毫无犯，对藏民和蔼可亲，实在是藏民可敬可信的朋友。

贺龙站起来，微笑着对八大老僧说，此次红军进驻中甸，归化寺对红军帮助很大，十分感谢，过几天部队就要开拔，一路急需粮秣，还望寺院为红军筹些。所筹粮秣，红军当公平买卖，务请寺院放心。八大老僧听了贺龙的话后，当即答应为红军筹办粮秣。随后，寺院僧侣举行了为红军祈福消灾的活动。贺龙见他们真心诚意地拥护红军，便将“兴盛番族”锦幛和一对精制的大瓷花瓶等赠给归化寺。

此后，归化寺打开粮仓，向红军出售6万余斤青稞和一些红糖、粉丝等食物。其他村寨也纷纷将粮草、盐等售予红军。

5月5日，红2、红6军团从中甸出发，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连续翻越几座雪山，于7月2日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下图：“兴盛番族”锦幛。

资料图片



她们把名字刻在“红飘带”上

■向贤彪

红色足迹

“赤虺一川弦弹古镇千年曲，红军四渡血沃神州万里春”，这是遵义市习水县土城古镇牌楼上的一副楹联。上联说的是古镇商埠千年的繁华，下联说的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荣耀。

秋日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土城古镇。一下车，歌声随风传来：“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爷爷拉着我的手深情告诉我，红军长征从这里走过，先辈的热血洒满山河……”歌声顿时把我的思绪带进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我依次参观了四渡赤水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陈列馆等处，最后来到中国女红军纪念馆。这是国内唯一以女红军为主题的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一尊《浴血天使》青铜雕像映入眼帘，造型是一位红军女战士跪着怀抱婴儿，象征战火中的守护与信仰。进入纪念馆序厅，正中间书写着“永远的女红军——巾帼铁流巍峨丰碑”的巨型灯箱熠熠生辉。灯箱两侧，是两面刻录有女红军姓名的名录墙。序厅后面的5个展厅，分别展示了600多张历史照片、200多件珍贵文物，生动记录了中国女红军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数百位女红军的生平事迹。

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能文能武，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女将领。她指挥的妇女独立师，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全师编制2500多人，训练有素、能征善战。在驻党坝期间，当地有一支500多人的反动武装，无恶不作。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张琴秋主动请缨，率领妇女独立师英勇杀敌，2个小时就结束战斗，一举打出了红军的气势和威风。

在红军队伍里，女红军是冲锋陷阵的勇士，也是出色的宣传员，用歌声和舞蹈鼓舞士气、凝聚军心。人们忘不了长征中的《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这首歌是女红军李伯钊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合写的。李伯钊能歌善舞，不仅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还编创了舞蹈，将战术动作融入其中。一时间，《打骑兵歌》及舞蹈很快在红军队伍中普及，通过艺术的形式，使打骑兵的战术得以广泛宣传运用，有效打击了敌骑兵的嚣张气焰，帮助红军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在纪念馆的“红色课堂”厅，一尊以雪山为背景，身着红色毛衣，手打快板唱着歌的女红军雕像格外引人注目，其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这名没有留下姓名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在翻越雪山时，同行的女战士看她身体单薄，把自己的一件红毛衣送给她。夹金山上，白雪皑皑，风雪肆虐。前进的队伍逐渐变得迟缓。这时，风雪中传来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大家亲切地称呼她是雪山上的“小太阳”。后来，“小太阳”把红毛衣让给了受冻的伤员，自己却长眠在了雪山。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著名作家丁玲在采访红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在数不尽的艰难困苦面前，她们不畏惧、不退缩，表现出的忠诚、勇敢、坚毅，让雪山为之低头。

长征翻越雪山时，严寒冻掉了女红军王定国的一根脚趾，她右腿此前还两次中弹受伤，可她却乐观地说：“我们是唱着歌走完长征的。”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自幼缠足。在长征途中，她一边带领女兵肩抗背驮物资，一边自编歌曲激励战友，硬是用一双“小脚”征服了万水千山。年仅13岁的红军女战士罗坤，因外出演出而迟归，回来时部队已经北上。她带着11个“红小鬼”一路靠乞讨、挖野菜生活，历时3个多月，终于追上了部队……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其中一位叫李小侠的19岁女孩，经邓颖超、李伯钊介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红军主力离开遵义时，组织安排她留下，加入遵湄绥游击队，在黔北坚持敌后斗争。《红星》报当年在报道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记录了她登台演说的事迹。

纪念馆内，“红梅凌霄”厅的大屏幕上，一株株红梅傲然绽放，蕴含女红军斗霜傲雪的宝贵品格。她们把名字刻在雪山、草地，刻在地球的“红飘带”上，更刻在今天我们的心上。

董必武同志曾以诗句赞颂长征中的女红军：“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这是对女红军的精准描述和热情歌颂。她们如同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小红军一样，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小太阳”，光焰永驻、激励人心。

红星在我心中

■杨光明

亲历者讲述

1934年，12岁的我参加了红军。我穿着军装，军装盖到了我的膝盖，像披了件长大褂，但很精神。别人都说我成了小大人。一个穷孩子，由破衣烂衫换上一身新军装，特别是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长征最艰难的时期，同志们爬雪山、过草地，长途跋涉，还要与敌人战斗。每天行军后，大家都精疲力竭，只能吃野菜和草根，最后连皮带也煮了吃。晚上，为了抵御严寒，我们互相背靠背挤着睡。每天早上集合行军时，都有同志在前一天夜晚牺牲了。但大家只要看到红五星，就勇气百倍、信心倍增。

在长征路上，我那件灰土军装穿破了，又没有新军装。当时，我是个“红小鬼”，就穿了件打土豪弄来的红条纹小布袄，但头上依然戴着那顶红五星八角帽。

长征中，红军官兵对红五星特别爱惜，总是保护得干干净净。剑门关战斗时，我所在的宣传队被分配去照顾病号。一位头部负伤的同志，头上裹着白绷带，手中紧紧抓着他的红五星八角帽。每当有战友牺牲，我们就会把红五星八角帽端端正正地戴在他的头上，以示哀悼。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要换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大家的心里都十分舍不得脱下红五星八角帽，不少同志为此还流下了眼泪。但为了抗日大局，我们服从了换装。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保留了一顶红五星八角帽。这顶红五星八角帽伴随我许多个战斗的日夜。在1941年沂蒙山反“扫荡”中，一次夜间疏散隐蔽，我不慎丢失了保存多年的红五星八角帽。至今想起这件事，我还是很心痛，恨自己太粗心，留下了不能挽回的遗憾。

如今，我已满头白发，每当看到文艺作品中出现红军形象，出现我心爱的红五星，我心情就特别激动。红星永远在我心中。

文章摘编自《红色血脉》（解放军出版社）第一卷——“深情颂伟业，永远跟党走”主题征文作品集（2023年出版），有删节。

（本版学术支持：褚银）